

中国—东盟传媒合作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李庆林*

摘要: 中国—东盟传媒合作对促进中国—东盟民心相通和中国开展周边外交意义重大。当前,中国—东盟传媒合作存在理论准备不足、合作机制不畅、合作方式单一等问题。未来,中国—东盟传媒合作应注意更新合作理念、强化智库建设、实现精准合作、重视社交媒体和视觉符号的运用等,进一步提升中国—东盟传媒合作水平,更好地为中国—东盟合作服务。

关键词: 中国—东盟; 传媒合作;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 G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19)02-0075-07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 –ASEAN Media Cooperation

Li Qinglin

Abstract: The media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s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the common aspirations of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ASEAN and developing China's peripheral diplomacy.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media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such as inadequat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poor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single cooperation mode. In the future, China-ASEAN media cooperation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update the concept of cooperation, strengthen the building of think tanks, realize precise coopera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and visual symbols etc., so a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level of China-ASEAN media cooperation and better serve China-ASEAN cooperation.

Key Words: China-ASEAN; Media Cooperation;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一、前言

发展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中国发展周边外交的既定方针。中国—东盟合作离不开区域文化认同,也离不开双方的传媒合作。一般来说,传媒合作就是指不同媒体之间的联合和联动,包括会议研讨、联合采访、联合制作、节目交换和人员交流等。随着全球化、区域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传媒合作日益成为一种潮流,这体现出事物发展的某种内在规律。对于中国—东盟传媒合作来说,它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传媒合作,而且是一种跨国界、跨文化的传媒合作,因而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和丰富的内容。

二、当前中国—东盟传媒合作存在的问题

2001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启动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新闻领域的交流合作呈现加速发展态势。2007—2017年,4次中国—东盟新闻部长会议和5次东盟—中日韩(10+3)新闻部长会议先后举行,为建立中国与东盟新闻领域的对话伙伴关系提供了合作框架。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先后牵头组织了4届中国—东盟媒体合作高层研讨会和7届东盟与中日韩(10+3)媒体合作研讨会,为中国与东盟

* 广西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

传媒界提供了良好的发声平台和发声空间。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各种层面、各种类型的论坛和联合采访以及联合制作新闻产品的活动持续举行,推动中国—东盟传媒合作不断深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中国与东盟的传媒合作在进程和力度等方面与其他合作领域相比还有差距,在促进中国—东盟民心相通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影响了媒体在中国—东盟合作中作用的发挥。

(一)理论准备不足,相互了解欠缺

在关于中国—东盟的学术研究中,传媒合作的议题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传媒业界,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总结提升的也不多见。这就使得中国—东盟传媒合作一开始就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研究一直不够深入和广泛,有关东南亚历史和文明演变的研究特别是对东盟国家媒体的研究难觅厚重的研究成果,这不仅是新闻传播理论界的问题,整个学界都存在这个问题。由于对东南亚历史发展和现状的理解与认识缺乏历史纵深,中国学者和媒体从业者有关东盟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上时常出现偏差。比如,中国学者和媒体报道常常强调儒家文化对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但是,除了中国的儒家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西方文化和日本文化等对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影响同样重要和深刻。这些情况常常被中国学者和媒体从业者有意无意地忽略。

在中国为数不多的有关东盟传媒的研究成果中,存在两个特点:一是关于东盟华文传媒的研究较为集中;二是有不少研究成果是研究东盟媒体是如何报道中国的。就第一点来说,鉴于东盟国家中确实存在着不少华文媒体,进行这样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很多研究成果是“就媒体而言媒体”,并没有将华文媒体与当地华侨华人的生存状况有机地联系起来,因而缺乏深度。就第二类关注东盟国家媒体是如何报道中国的研究成果来说,虽然研究的对象延展到了东盟国家的许多非华文媒体,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往往是就某一媒体、某一事件来展开的,研究角度和视野都相对狭窄。由于对东盟各国传媒体制和传媒生态的整体状况缺乏足够把握,这些研究成果并不能对东盟国家一些媒体记者的观点和报道有深切的理解。同时,在中国关于东盟国家媒体的研究中,有相当数量的作者是来自新闻传播院系

的老师和学生,其论著的“书斋味”较浓,与传媒业界的实际需要有一定的距离。就传媒合作的实践来说,传媒业界更需要对东盟各国的传媒政策法规、运行模式和发展生态等有透彻的了解和把握,并对东盟各国主流媒体的发展历史、资本和人员构成、报道方针和职业伦理等做全面细致的摸底调研的研究成果,只有这样的研究成果才能帮助中国媒体有针对性地找准合作对象、选择合作方式、拿捏合作分寸,减少合作的随机性和盲目性,进而提高合作效率。

理论研究的不足使得中国—东盟传媒合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中国—东盟传媒合作在选择合作方式、理顺合作机制、在合作中取长补短等方面缺乏明确的目标和蓝图。不少中国媒体采编人员对东盟国家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公共外交、周边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等方面的理论素养不足;对中国—东盟合作的内涵了解不够,利用中国—东盟合作的机会充实报道内容、实现传媒国际化等意识不强。

(二)各种合作机制和交流平台存在交叉重叠现象

中国—东盟合作是通过诸多合作框架和合作机制来进行的。东盟前秘书长素林·比素万曾说,在东盟的所有对话伙伴国中,中国与东盟建立起的合作机制最多、范围最广^①。中国与东盟的传媒合作是在这些合作机制框架下展开并为之服务的。

中国与东盟合作的主渠道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次区域合作机制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和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1992年起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倡议下开展起来的,由流域内的6个国家共同发起,参与方包括中国、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和泰国等6个国家。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6国(即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围绕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实施可持续开发和开展互惠务实合作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于2016年3月23日在中国海南三亚启动。推进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是为落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促进次区域发展与繁荣,建立互利互惠

^①《中国—东盟合作之路将越走越广——访东盟前秘书长素林》,《参考消息》网站, <http://world.cankaoxiaoxi.com/2013/0821/259380.shtml>, 2013年8月21日。

与合作共赢的平台。自2016年启动以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发展迅速,已经得到湄公河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参与,是未来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方向。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是把原来中国与越南的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延伸到与北部湾海域相邻的南海沿岸的东盟国家。环北部湾经济圈是中越两国政府正式倡议建立的“两廊一圈”合作机制中的“一圈”。“两廊一圈”最早于2004年5月由越南政府总理潘文凯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出,同年10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越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时,中越双方对此达成共识。“两廊”即中越“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和“南宁—凉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一圈”即环北部湾经济圈,涉及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云南省、海南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及越南的10个沿海地带。两条走廊共跨度14万平方千米,总人口为3900万。“两廊一圈”是推动中越经贸合作发展的重要设想和规划,在中国得到广西、云南两省区的积极响应。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是在2006年7月举行的首届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上提出的。在这次论坛上,时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刘奇葆首次提出“一轴两翼”经济圈构想,“一轴”即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两翼”即湄公河流域经济走廊和泛北部湾经济圈。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是联结中国沿海经济地区与中南半岛各国最为快捷、经济效益最佳的陆上通道,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陆路支撑,也是深化中国—东盟合作和拓展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关键区域,对于中国构建区域合作具有独特作用。

目前,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已构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陆上一翼”;而开展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推进海上多边建设则构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海上一翼”。两者海陆并进,不断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此外还有一些更为具体的合作项目,例如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建设,中国、老挝、缅甸、泰国4国毗邻地区建立“黄金四角经济合作区”,等等。其中,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成立于2013年,是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见证下成立的合作平台,是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18个首批项目之一。目前,以中国广西钦州为核心基地的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已有24个港口、城市及有关港航机构加入,涵盖了中

和东盟有关国家的主要港口相关机构,在各方通力合作之下,合作网络覆盖面已越来越广,工作机制初步建立,海上航线不断加密,港口投资合作持续升温,临港产业合作日益深化,通关便利化水平明显提升。

以上由多方参与的多种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长期并存,各自发挥不同功能并满足多层次需求和各方利益,既有相互支持的一面,又有相互竞争的一面。特别是一些合作机制在合作目标、领域和项目等方面存在相互交叉和重叠的现象。中国与东盟传媒合作是在以上各种合作机制的框架下展开的,这些机制之间存在的问题都会反映到中国—东盟传媒合作中。从现有的中国—东盟传媒合作的情况看,虽然交流合作的平台和机制不少,但平台间各自为营、交叉重叠的现象明显。例如,以中国—东盟媒体合作为名头的论坛平台就有三四个,由于主办和承办单位不同,平台建设质量参差不齐,相互间缺乏交流和协作,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不少资源。

“真正的合作机制,是指在双方或多边的合作系统中,合作各方的相互关系以及行为过程所必须遵循的制度化的方式和方法,包括为保证这些方式方法发挥作用的必要的机构设置。”^①如果没有一个完善、有力的协调系统和协调机制,没有一个正式的渠道,这样的合作就很难进入更高的层次,也很难保证长久而有序的发展。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一些新闻官员和媒体负责人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但遗憾的是,一个有力的中国—东盟媒体协调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三)合作方式单一,合作面窄,合作的随机性和应景性强

从涉及的媒体机构来看,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媒体合作中,传统媒体多,新媒体少。在中国,以官方组织名义“请进来”的情况较多,而以媒体名义“请进来”特别是以民间机构“请进来”的情况比较少见。从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印象来看,官方媒体自然不用说,一些主流媒体在外国媒体眼中也常常被视为官办媒体,这会对以“请进来”为主要方式的中国—东盟传媒合作的效果造成影响。

在与中国开展合作的东盟国家媒体中,华文媒

^①全毅、尹竹:《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创新》,《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6期。

体多,当地主流媒体少。东盟国家华侨华人众多,因此,每个东盟国家都有华文媒体,其中的主流媒体数量在30家以上,东盟国家也有部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出中文节目。但是,华文媒体在东盟国家的发展也存在局限。在大部分东盟国家中,当地居民接受信息主要依靠使用当地语言文字的媒体,华文媒体在发行量和受众群体的范围上都有其局限性。例如,虽然华人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数较多,但是,近几年,英文媒体的强势发展和新媒体的迅速普及令华人媒体的受众群体不断流失。

在传媒合作方式上,中国与东盟总体上还只是停留在传统的人员互访、相互报道、技术交流与合作以及交换新闻产品等较低层面上,内容生产上的合作是有,但并不多,版权合作、渠道合作、媒体管理和资本合作等明显缺乏。

现如今,互联网已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主要途径,但是,中国新媒体在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发展还显得相对滞后。例如,中国一些主流媒体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和优兔(YouTube)等国际网络平台上都开设了账号,但数量少,在质量上也存在不少问题。近年来,中国许多主流新闻网站都开设了有关东盟的频道或专题,对宣传中国—东盟合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同时,从总体上看,这些主流网站的官方色彩浓重,新闻稿件基本来自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原创性不够,多语种传播、多媒体利用以及网站交互性等方面的质量不高。

传媒合作的最终目的是要生产出高质量的新闻产品,只有新闻产品才是媒体影响力的来源。合作方式单一、合作面较窄以及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使得各类媒体在中国—东盟合作的相关报道中随机性、随意性较大,系列化和有深度的报道较少。在中国—东盟合作相关的重要论坛和联合采访期间,双方媒体的一些新闻报道表面上看声势很大、很热闹,但大多只是报道相关领导、专家、商界精英的活动和发言情况,很少有新闻媒体和记者能够通过深入采访和挖掘,就有关活动及中国—东盟合作的新亮点、新动向进行持续性和全方位的跟踪、透视、报道和评析。

三、提升中国—东盟传媒合作水平的对策建议

中国—东盟传媒合作对促进中国—东盟民心相

通和中国开展周边外交意义重大。近几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合作交往日益密切,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媒体必须尽快适应这种需求,努力探索合作新途径,进一步加强实质性的交流,为中国与东盟进一步扩大合作做出传媒界应有的贡献。为此,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重视共同利益,强调共同发展,寻求最大共识

传媒合作不仅要共享技术和信息,更重要的是塑造共同的价值理念,形成共同的群体利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要对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①媒体可以通过对于区域内共同的民生问题如环境问题、贫困问题等的关注,让构建命运共同体成为媒体共同的议题,共同发声,使命运共同体概念更广泛地深入到每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心里去。

中国媒体在寻求与东盟国家媒体进行合作时,目标不应仅仅是为了发出“中国声音”,也应是发出了“共同声音”。因此,中国与东盟的媒体应求同存异,兼顾双方感受,注意双向沟通。就中国媒体而言,则是需要把握好“宣外”与“外宣”之间的平衡,在注重“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同时,强化国际传播意识。

中国—东盟传媒合作是在尊重双方在媒介观念、体制、报道方针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前提下,通过合作加深了解,寻找共同点并实现合作共赢。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尊重的心态很重要。中国与东盟各国应在尊重各自的国家制度、文化传统和媒体观念的前提下,从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视角出发,思考亚洲媒体传播的现实需要,理解并解释亚洲新闻传播存在的矛盾和争议,探索亚洲新闻传播的对立统一,找到各国普遍认同的亚洲媒体传播价值观,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与亚洲视野、亚洲意识相结合、相贯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东盟成员国中,一些国家有强烈的主权意识和民族主义观念。中国作为区域大国,综合国力较强,应该更多地倾听东盟国家的诉求、考虑东盟国家

^①钱彤:《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25/c1024-23332318.html>, 2013年10月25日。

的现实关切和实际利益,减少东盟国家的对华疑虑心理,确保中国—东盟合作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钟新对此就有切身体会。2016年年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承办了由中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委托的巴基斯坦青年记者来华短期培训项目。在筹备过程中,主办方在活动场地布置时一直使用“培训”二字,但在审视开班式大屏幕文字时,钟新教授想到,巴基斯坦的青年记者们看到“培训”二字时可能会觉得不舒服,会认为自己被主办方当作学生了,临时决定更改项目名称为“交流”,收到良好的效果。一些巴基斯坦青年记者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多次告诉钟新教授,这样的交流模式很好。为此,钟新教授领悟到,类似的活动应当尽可能地以“交流”的名义进行,在用词上注意平等、尊重^①。

(二) 强化智库建设,深化理论研究

智库可以为中国—东盟传媒合作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当前,中国全国性的东盟研究智库网络主要有两个: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NACT)和中国—东盟大学智库联盟。

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NACT)是由中国政府发起的旨在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在2012年举行的第15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正式提出建立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的重要倡议。在2013年7月举行的纪念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研讨会上,中国与东盟国家一致同意建设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中国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被指定为中国国家协调单位。目前,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在中国已拥有广西基地(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广东基地(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南基地(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和福建基地(厦门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等,相关课题和项目研究正在不断展开。

中国—东盟大学智库联盟成立于2016年10月31日,由东盟大学联盟(AUN)成员、成员的智库和中国教育部指派高校组成,秘书处设在中国广西大学,其建设目标是依托中国—东盟大学的学科资源和人才优势,加强学者、学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智库力量,开展政策沟通,打造智库交流平台,为中国与东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中国—东盟大学智库联盟将

以3年作为一个周期,滚动进行课题研究和调研计划;每年定期在中国广西南宁举行共同学术论坛;不定期邀请该领域相关专家学者聚会进行学术交流。中国—东盟大学智库联盟将在解决中国与东盟相关问题、推动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形成优秀学术成果。

在中国,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贵州大学东盟研究院、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和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等都是研究中国—东盟关系的重要智库。其中,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于2014年启动了中国—东盟全息综合数据平台建设,这是一个囊括中国—东盟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和资源等相关信息的综合数据库。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东盟全息综合数据平台已采集了2000多万条数据,能够为企业或个人的投资与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中国—东盟研究院下属的中国—东盟舆情监测中心于2015年9月成立,主要负责东盟及东盟成员国信息与文献资料收集、数据库源数据整理、期刊文献管理以及舆情周报发布等。

自2004年起,广西社会科学院每年组织编纂《中国—东盟年鉴》,这是一部国际综合性年鉴,着重收录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基本资料及区域内各国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至2017年已经出版14卷。《中国—东盟年鉴》主要包括概况、动态、专题、新闻人物、大事记、文献、投资贸易指南、统计资料和附录等栏目,旨在为海内外各界人士了解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基本情况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供一个窗口,以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相互了解 and 交流合作。

未来,中国—东盟传媒合作的理论研究应依托以上智库平台,深入研究东盟10国传媒业的发展现状,包括传媒业内部发展情况(人员、设备、规模、管理、效益、报道角度、报道内容、报道倾向、受众特点和传播效果等),各国新闻体制、传媒产业政策等宏观环境,东盟各国新闻主管部门、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东盟合作相关议题的关注度和观点看法等,同时,要加强对东盟国家的舆情研判。

^①钟新、王岚昕:《“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合作传播的模式分析》,《新闻战线》2017年第9期,第41页。

(三) 注意合作机制的协调和优化

机制,简单地讲,就是“制度加方法”或“制度化了的方法”。中国—东盟传媒合作机制建设需要建立一个完善、有力的协调系统,提高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的运作效率,对复杂的区域合作机制进行协调和整合,推动各方合作由功能性向制度性转变。

目前,中国已设立总规模为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为双方基础设施等重大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中国还设立了中国—东盟合作基金、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合作基金和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等,支持双方具体领域务实合作。笔者认为,有必要在适当时候设立中国—东盟传媒合作基金,成立一个由政府主导,外事部门牵头,新闻出版、对外宣传、文化、教育、体育和旅游等部门组成的专门机构或基金会来负责管理,这将大大推动中国—东盟传媒合作。在中国—东盟传媒合作基金和双方主流媒体的支持下,参照“中非报道奖”的做法,设立“中国—东盟报道奖”,定期开展优秀媒体报道评选活动,进一步提高中国—东盟媒体报道质量,加强中国—东盟传媒合作。

设立一个与中国—东盟传媒交流合作相关的办事机构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建立中国—东盟传媒合作协调机制,有助于组建中国—东盟传媒合作网络,从而更为有效地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新闻信息资源的交流共享,提高区域信息化水平,为推动中国—东盟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更大效能。

一些连续举行、持续多年的相关论坛、研讨会或联合采访活动等,应继续坚持发挥其已有的影响,不断创新办会方式方法,扩大品牌效应,让这些重要的交流平台建设实现机制化、常态化。

推动中国为数不多的一些媒体联盟组织积极与东盟媒体联盟机构对接,比如与亚太广播联盟(ABU)、亚洲新闻联盟(ANN)和东盟记者联合会(CAJ)等机构开展合作,通过搭建媒体联盟之间的合作平台,实现资源共享,进一步促进中国—东盟传媒合作。

(四) 一国一策,一事一议,实现精准合作

东盟10国有其复杂、多元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每一个国家对于中国—东盟合作的诉求和关注点都不一样,在中国—东盟传媒合作上也是如此。因此,中国在开展与东盟国家的传媒合作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东盟各国,针对不同国家的发展

水平、文化背景和媒介环境找到合作的契合点,实现更加具有针对性、更精准的合作,并以双边合作推动多边合作。

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东盟10国大致可分成4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经济较为发达的新加坡和文莱;第二层次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第三层次是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越南;第四层次是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柬埔寨、老挝和缅甸。有研究成果指出:“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中国—东盟关系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会对中国—东盟关系产生较显著影响。人均GDP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民富裕程度”,“人均GDP与中国—东盟关系表现出负相关,即人均GDP较高的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并不是很紧密,而人均GDP较低的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相对更紧密”^①。按照这个标准,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东盟国家如老挝、柬埔寨与中国的关系相对更紧密,在传媒合作上的需求也更为明显。

从宗教文化上看,泰国、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主要信奉佛教;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主要信奉伊斯兰教;菲律宾主要信奉天主教;越南和新加坡则没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总体而言,中国与东南亚佛教国家在宗教文化上的交流会更多一些。

以老挝为例,近年来,中国与老挝高层交往频繁,以中老铁路、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为代表的经贸合作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中老两国的传媒交流也日益频繁。目前,已经有中国老挝文《占芭》杂志、中国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云数传媒等多家中国媒体在老挝首都万象设立办事处,其新闻报道和节目深受老挝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和喜爱。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在东盟10国中,泰国也特别值得重视。泰国位于中南半岛的中心,领土面积在东盟国家中排名第3,工业化水平明显高于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外的其他东盟国家。作为东盟的创始成员国之一,泰国在东盟和东南亚地区事务中有重要的影响力。泰国有着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具有很强的开放型和包容性,华人文化已成为泰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泰国与中国不存在领土争端,泰国可以作为第三方在南海问题上发挥协调者

^①范祚军、张宏杨:《中国—东盟合作关系中政治与经济影响因素测度》,《经济研究参考》2014年第59期,第59页。

的作用,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协调与互信^①。目前,中泰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合作发展全面、联系紧密,两国的传媒合作也有很大进展。泰中记者协会于2015年1月28日在泰国首都曼谷成立,这是一个由泰国记者和在泰国工作的中国记者组成的媒体机构,致力于促进中泰两国媒体记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为增进中泰两国的合作和友谊贡献力量。协会理事会为最高管理机构,首届理事会成员分别来自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等中国驻泰媒体以及泰国《经济基础报》《泰叻报》和泰国电视7台、泰国Spring News电视台等当地主流媒体^②。

因此,笔者认为,在普遍加强与东盟国家传媒合作的基础上,中国可重点发展与老挝和泰国等国的传媒合作。

(五) 重视社交媒体和视觉符号的运用

近年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正在给新闻媒体带来一场革命。亚洲新闻联盟(ANN)秘书长帕纳·简沃热(Pana Janviroj)曾说:“数字化技术是最国际化的语言之一,它以一种其他交际手段没有的方式触及到所有人。”^③互联网和新媒体以其信息海量、互动性、移动性、即时性等优势引领着新闻传播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成为中国—东盟传媒合作的新方向和新平台。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8.0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7.7%;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人。东盟也正在经历网民高速增长期。截至2016年6月,东盟10国的网民渗透率达40.67%,规模总数达2.6亿人,位居世界第4^④,其中,以柬埔寨和缅甸的网民增速最为迅速,增长率达到34.74%和32.38%。东盟国家的网站也出现了从个人计算机(PC)端向移动终端转移的趋势,移动客户端的应用增多。社交媒体成为影响民众生活和承载、传播信息的重要工具,越来越多的读者通过手机来阅读新闻和获得信息。据美国脸书公司(Facebook)2016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其全球用户总量约为16.5亿人,其中,有54.2%的用户只通过移动终端访问和浏览脸书社区,在脸书上的活跃用户中有三分之一在亚太地区。而且亚太地区用户的年增长率约为20%,比脸书在全球范围内的用户增长率高出近6个百分点。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成为东盟信息传播和国际话

语权争夺的全新领域。

顺应新媒体的发展趋势,中国应高度重视与东盟各国在社交媒体和移动终端方面的合作。鉴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社交媒体平台发展的差异,应大力鼓励和支持新浪微博、腾讯微信等中国的商业化新媒体“走出去”,加快海外拓展的步伐,加大推广力度,推动新媒体在中国—东盟传媒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移动视频业务发展迅猛。多项研究表明,视觉是人类感知世界的首要方式,在相同的时间空间内,视觉符号所传达的信息量要远远多于文本文字,而且更易于接受。表情和眼神、手势和动作在不同文化之间有基本相通的含义,视觉符号本身具有的直观性、形象性等特点在传播的很多情况下可以超越文字传递信息的局限,促使不同的文化实现更方便、快捷地交流沟通。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当语言传播遭遇障碍时,非语言的传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读图时代”的今天,视觉传播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特征。在新媒体和移动媒体环境中,“用视频讲故事”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相比文字新闻,影视作品更能全方位地反映、还原相关国家的民族面貌、社会文化和生活习俗等。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中国—东盟传媒合作应当充分重视视觉符号的运用,在继续扩大影视交流的同时,注重新闻信息可视化以突破源于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障碍,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民心相通。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2013年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过程中的信息生产、交流和共享机制研究”(SK13ZD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马金案)

①张锡镇:《泰国在中国—东盟关系中的桥梁作用》,《泰国蓝皮书:泰国研究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②《泰中记者协会成立仪式在曼谷举行》,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129/c1002-26468316.html,2015年1月29日。

③《亚洲新闻联盟秘书长:新媒体合作成为地区推动力》,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531/c1002-28399563.html,2016年5月31日。

④Internet World Stats 2016.